

# 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

邢建昌

**【摘要】**后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已近20年,留下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清理,后理论与理论的终结、抵制理论、反理论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说明。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对理论的抵制,也不是反理论。从特定的语境和知识学模式分析,后理论与“抵制理论”“反理论”具有精神上的暗合之处。后理论是一种对大理论的怀疑态度,一种理论反思的倾向或转折的趋势,甚至是一种回到文学(性)传统和重启审美主义的理论主张。后理论不以建构理论形态、理论思潮为目标,所谓生态伦理、生命政治、后人类、新美学、新叙事学、新文学理论等,不过是理论在后理论精神氛围下自身的一种调整、修复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关键词】**后理论;终结;抵制理论;反理论;反思

**【作者简介】**邢建昌(1963-),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当代文化批评等(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家庄),2021.1.93~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知识生成机制的反思性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BZW002)。

后理论在中国的讨论已近20年,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吗?四位作者的文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汪正龙《理论的危机与后理论的几种进路》以丰富翔实的一手文献和扎实细腻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后理论的基本特征(跨学科性,小写的理论、自反性)及其发展趋向(在之间、文学的扩容)。邢建昌《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针对理论界流行的关于后理论认知误区展开分析,着重揭示了后理论与理论的终结、抵制理论、反对理论等的关系,认为后理论与抵制理论、反理论在精神上有暗合之处。杨建刚、张林轩《从神谕到对话:“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反思》看到了后理论的反思性质,强调从“理论与神谕式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作为别一种理论的后理论。王亚芹《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则揭示了后理论作为知识型的性质,指出后理论提供了观测未来人文学科走向“大融通”的新视点。四位作者的研究说明,真正的理论探讨不以追逐时尚为目标,而总是基于问题的。只要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学术研究就无所

谓新旧,而永远在路上。而在经历了后理论的转向之后,理论也许会收缩它的地盘,回到常态,作为工具箱而发挥作用,并有能力对自己的有所不能保持警觉。

从21世纪初的零星介绍到当下蔚为大观的研究,后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已近20年。后理论制造了中国文论的未来憧憬与话语喧嚣,以“后理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相关论文多达1100余篇。这些论文有的是分析后理论本身的概念流变和产生的知识语境的,有的是讨论后理论与理论、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更多的是以后理论为抓手或切入点来言说本土文学理论问题的。每一个言说者根据自己的设想定义了后理论的内涵和特点,这使得本来就“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后理论平添了几分迷离。言人人殊、各说各话,共识难以达成。当潮汐退却、豪华落尽,我们需要反思的激情,只有不懈地进行反思(再思甚至否思),才可以明晓理论言说的限度,保持知识的警觉状态。后理论是什么?是理论思潮、理

论形态,还是理论转折或理论趋向?该怎样理出一条后理论的知识谱系?后理论与当下沸沸扬扬的理论终结论、抵制理论和反理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后理论我们应当汲取怎样的智慧?这些无疑是当下理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 一、后理论的由来

后理论(After Theory or Post Theory)的概念发生较早,远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年)出版之前。1990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的*After Theory: postmodernism/postmarxism*一书就使用了“After Theory”<sup>①</sup>这一提法。1996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理论”衰落之后状况的研讨会,之后,会议论文集以*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为名出版,这是理论界较早以“后理论”命名的著述。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理论死亡”“理论终结”以及“理论”的危机与转折等。主编之一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理论被宣告死亡”来表达对“理论死亡论”的不满,强调后理论无止息的探索精神:“后理论是指一种思考状态,它总是处于一种延异的状态、一种反思的姿态以及一种质疑的体验中,总是将它自身置于与理论悖论的纠缠中。后理论对它必须面对的他者讲话。即使我们称之为后理论的思想立场并不会触及或者在它的机构化他者身上留下痕迹,它仍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sup>②</sup>

大卫·鲍德韦尔(David Bordwell)与诺维尔·卡罗尔(Noel Carroll)主编的*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sup>③</sup>讨论大理论(Theory)的终结,以及“大理论终结”之后可能和应该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具有典型的后理论特质。所谓“大理论”(Theory),又称“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电影研究中大行其道的“由各种学说规则构成的聚合体”或“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的统称,它们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变异的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

“大理论”被认为是理解所有电影现象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试图改变这一现象,认为“历史语境”比“理论化概念”更具有可操作性,真正的电影研究“无需诉诸那些曾经用来构成所有循规蹈矩的电影反思基础的理论学说”,与其煞费苦心将研究建立在大理论的地基之上,不如采取对大理论构成“强大的挑战”的“中间范围”(a middle-range)的研讨,“这种碎片式的重视解决问题的反思和研究,迥异于宏大理论虚无缥缈的思辨,也迥异于资料的堆砌”。后理论标举“大理论”之后的“复数的理论和理论化的行为”“让五花八门的‘中间层面的理论’(middle-level theories)在电影研究领域内竞争”。对一部作品在“认知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心灵哲学的视野中”进行细读,以揭示出文本“生动而悬殊的差异性”,这成为后理论电影研究的一个取向。《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雄心在于颠覆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理论模式,开启“多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面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重建电影研究<sup>④</sup>,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后理论精神资源。不知什么原因,《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一度被忽略了,该书汉译本出版的最初几年鲜有相关的讨论。理论界对后理论的接受,实际是从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与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等人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两本书开始的。<sup>⑤</sup>

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英文版2003年,中译本2009年)是国内关于后理论言说的重要参照。最初几年,理论界几乎是循着“理论之后”的思路讨论后理论的。伊格尔顿的确出手不凡,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引起国内理论界热烈的反响。可以说,《理论之后》深刻影响了国内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场域。以对“理论之后”的解读为契机,理论界掀起了“理论的终结(死亡)”“抵制理论”“反理论”等的讨论,也展开了理论之后文学理论何去何从等等的分析预测。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之后》中的“理论”

不能从通常的意义上理解,它是有特指的。“理论”即Theory,英语中的第一个单词一定是大写的。Theory即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高端理论(High Theory)、文化理论(Culture Theory)。“Theory”的底色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20世纪60—90年代是理论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理论时代”。“理论时代”的特征是理论无处不在,理论辐射到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帝国时代”由此而得名。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出现了。理论不是静态的知识,理论是批评,理论是行动,理论是参与——一句话,理论是运动着的话语。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的这种性质做过说明:“在最近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讨论——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对任何一位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这种用法一定显得很怪,‘关于什么理论?’你肯定会这样问。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它既不是任何一种专门的理论,也不是概括万物的综合理论。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你有可能被卷入到理论中去,你也有可能教授或学习理论,你还有可能会痛恨和惧怕理论,只不过,所有这些对于理解什么是理论,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sup>⑥</sup>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观点,理论既不是过去那种围绕某一研究对象、某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专门的理论”,也不是依托哲学基础基于一般性找寻的“综合理论”,理论更像是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理论怎么会是一种活动呢?活动,当然不是指人与世界遭际的处身性活动,而是通过语言实践显示出来的话语行动,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的功能和特点之所在。这里,理论似乎更像是一种观念、方法、原则(知识型)的结合体,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介入力量,成为众多学科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卡勒说,理论是和一大堆名字(比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露丝·伊利格

瑞、雅克·拉康、朱迪斯·巴特勒、路易·阿尔都塞、加亚特里·斯皮瓦特等)联系在一起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现象学、批判理论等,都不只是属于文学的,它们同时也属于文学之外的众多人文与社会科学。正是这种理论,使文学理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理论之后》讨论的正是作为大理论的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伊格尔顿强调: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伊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壮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sup>⑦</sup>

表面看,文化理论黄金时代的过去是与一批大理论的代表人物的去世或不幸的遭遇联系在一起的,如罗兰·巴特的车祸遭遇、米歇尔·福柯的身染艾滋病,阿尔都塞的被关进疯人院等等,细读《理论之后》你会发现,文化理论的衰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理论批判锋芒的消失。左派政治的失利导致左派政治家将目光转向新兴的消费文化,试图从新兴的消费文化中发现民主和抗议的力量。但这样一来,急迫的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和象征符号问题,文化理论本应承担的历史维度和政治维度受到削弱。伊格尔顿不满于文化理论批判锋芒的削弱,尖锐指出:“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sup>⑧</sup>伊格尔顿希望重建理论的政治维度,超越“重复”和“老生常谈”,向“新的话题”,向过去文化研究“一直不愿碰触的话题”敞开胸怀。《理论之后》并没有拒绝理论,相反,伊

格尔顿依然坚守理论,相信“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sup>⑨</sup>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英译本初版于1985年,汉译本2006年),是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撰写的一部导读性质的著作。该书初版至2005年的20年间有过5次修订。第5版修订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后理论”一章:

然而,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却奏响了新的调子。似乎引发上述焦虑的那些理论岁月已经过去了。一批论著(其中的一些下文将论及)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读到了瓦伦丁·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 Michel Rabaté)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1999年)、《理论还剩了什么?》(2000)、《生活:理论之后》(2003)等文集。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因为大家的共识是,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消失的不仅是理论那个权威的大写字头,还有和它紧密联系的一群明星的名字,特别是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联系在一起的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那些人: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波德里亚、利奥塔德、克里斯蒂娃、西苏、斯皮瓦克、芭芭和詹姆逊,这些人主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思想。<sup>⑩</sup>

这是被理论界广泛引用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描述“后理论”发生,在文笔格调上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对这段话的解读缺乏耐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把《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的“‘后理论’转向的时代”置换成了“后理论时代”。其实,这里的“转向”是不能

省略的。“转向”表明一种转折的意味,一种正在发生的过程,一种端倪中的事物,一种生成中的趋向,抽去“转向”二字,“后理论”仿佛已然作为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想当然的误解。“后理论时代”能和“全球化时代”“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或“后人类时代”一样承担起对一个“时代”命名的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后理论”还构不成一个时代,原因在于后理论既不是一种理论形态,也不是一种理论思潮,不过是理论的一种最新走向、一种症候。为防止误解,《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还在“‘后理论’转向的时代”之前加上了“说得模糊一点儿”的修饰语,以提醒人们对这一提法的慎重使用,而将“‘后理论’转向的时代”置换成“后理论时代”,“后理论”所包含的探寻性、可磋商性、含混性的特性被有意无意忽略了。这是“后理论时代”论者对“后理论”的最大误解。<sup>⑪</sup>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之谓“后理论”,包含 After theory 和 post theory 两个维度。After theory 强调的是后理论发生在理论之后,这是一个带有时间性质的描述,如伊格尔顿之“After theory”;而 Post theory 则包含着对过去理论的怀疑、反思或否定的味道,表达的是与之前理论的一种紧张关系。整合 After theory 和 post theory 的涵义,可以把后理论视为理论发展的一种最新状况,具有时间意义的当下性。但后理论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是一种与之前理论一刀两断的新的理论形态或理论思潮,而更多带有观念、方法、主张、知识学模式的性质,是(后理论语境下)众多(小写的)理论对待理论的一种态度,它本身却不构成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思潮。不仅如此,后理论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它还包含着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反思和怀疑,包含着对后现代主义丢弃的那部分内容的有限回归或拾起。21世纪新千禧年到来之时,一些理论著作不约而同地聚焦理论——不仅思考作为一般性的理论,而且思考黄金时代文化理论问题,提出大理论之后理论何为、理论还能做些什么?这正是后理论的精神气质。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对“‘后理论’转向的时代”理论的某些趋势进行了描述,无论是对文学性回归的强调,还是对作者生平、传略、事实考证与版本等传统研究的再发现,抑或对新审美主义的提倡等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积极回应时代挑战的结果。但是,《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对“‘后理论’转向的时代”理论的走向描述语焉不详,这带来了人们对后理论理解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国内许多对后理论读解与阐释的文章,往往就是从这些有限的文献和资料出发而进行的。而且,由于后理论与所谓“理论的终结”“反理论”“抵制理论”等并置在同一个历史语境或理论时空里,人们常常在同一性意涵上交叉使用其中的概念,这带来了理论研究的混乱。这也是后理论言说走不出“阐释的焦虑”的原因所在。

把后理论视为理论研究的转折倾向或反思态度,是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后理论并不试图否定已有的理论——哪怕是对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也不试图建构自己的理论形态,哪怕后理论之后出现了众多风格独异的理论形态或理论思潮——例如生态伦理、生命政治、后人类以及“新”旗号下的各种理论主张(新美学、新文学理论、新叙事学)等<sup>⑩</sup>,但这不是“后理论”的形态,而是经过后理论洗礼之后理论进行的调整、修复和最新进展。倡导摆脱宏大理论的干扰,采用更为接近文本的理论或方法,把大理论置换成小叙事(多样的理论),依托特定知识型展开叙述等,这是后理论最为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通过后理论的提倡,理论研究实现了在场性、及物性,保持了“上手”状态。

## 二、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

后理论无法回避大理论的终结问题,但从来拒绝理论,更不是理论的终结论者。后理论对理论采取了更具反思性和建设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后理论在与众多理论形态或思潮的对话中始终秉持自己的问题意识。

把“后理论”视为“理论的终结”可能是受了伊格

尔顿《理论之后》的影响。王宁认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这部颇具冲击力的著作问世,显然是为‘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sup>⑪</sup>。在另一篇题为《“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出路》的文章中,王宁还是这样说:“2003年,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一部颇有争议的专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为已经在西方学界响起的‘理论之死’的声音进一步推波助澜。”<sup>⑫</sup>相隔10年,王宁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认识没有变化。仔细分析,这些话具有明显的误导性。《理论之后》开篇明明是宣布“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却被王宁理解成是对“理论终结论”或“理论死亡论”推波助澜。更具有误导性的还是下面这段话:“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文学理论将返回前历史时期的天真烂漫状态。”<sup>⑬</sup>这里,“文化理论”被王宁转述为“文学和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和“文学与文化理论”能画等号吗?显然不能,因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使用的就是文化理论(Culture Theory),而不是文学与文化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怎么可以在“文化理论”前加上“文学”二字?显然,这种翻译不过是作者急于表达自己“心中的故事”而有意为之的行为。仔细推敲《理论之后》的原文,我们也找不到伊格尔顿说过“未来的文学理论将返回前历史时期的天真烂漫状态”这句话,相反,伊格尔顿完整的原文是这样的:“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sup>⑭</sup>显然,伊格尔顿是不赞同“未来文学理论将返回前历史时期的天真烂漫状态”这个观点的。这种误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外语阅读的障碍所致,那只能归因于学术的不严谨了。《理论之后》不是伊格尔顿宣布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的书,而是对文化理论的反思和理论的自我拯救。正如伊格尔顿强调:“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

视《理论之后》为理论的终结这种观点也出现在

其他一些学人的著述里。金惠敏认为《理论之后》宣布了“理论的终结”。他说：“通过《理论之后》(2003)一书,他(指伊格尔顿——引者注)宣布了‘理论的终结’——‘文化理论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伊格尔顿通过‘理论之死’这种振聋发聩的形式唤醒人们对于后现代理论之局限的反思。”<sup>⑤</sup>伊格尔顿之“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不仅被金惠敏读解为“理论的终结”,而且极端地读解为“理论之死”,理论就这样在中国的一些学者那里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张箭飞甚至认为《理论之后》“敲响了理论的丧钟”<sup>⑥</sup>,这也是需要商榷的观点。伊格尔顿从来不怀疑理论,更谈不上为理论敲响丧钟,他曾得意地说自己是“有政治头脑的文学理论家”,对那种攻击理论的做法给予了坚定的抨击。他接受对理论的指控,断然拒绝那种对文学理论的生硬的指责:“认为文学理论家靠干枯的心灵和肿胀的大脑识别不了隐喻,更别谈识别敏锐的情感了,从而认定是他们杀死了诗歌,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愚钝的批评滥调之一。”<sup>⑦</sup>伊格尔顿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强调他从来没有说过理论的终结。<sup>⑧</sup>既然伊格尔顿都不承认自己是理论终结论者,那何来《理论之后》是在为“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呢?

“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是这些年来在理论讨论中的一种声音。对此,我们要做理性分析。“终结论”是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经常出现命题。如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等等。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书中,从追问“哲学研究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出发而终结了传统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研究的是“意识的主体性”,此前哲学认识论因切断了与认识活动的本源联系而陷入死胡同。所以,古希腊以来的哲学认识论必须终结,一种更为本源的知的方式必然出现,这就是《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讨论的主题。<sup>⑨</sup>由此看来,“终结”是一个哲学术语或人文术语,不是指物理学的、实然意义上的

终止或消亡,而是指某种观念、思想或思维范式失去解释力,或变换自己的形式而在新的观念、思想或思维中的转化与生成,因此,切不可“终止论”“完成论”或“死亡论”来理解之。终结既含有了断、结束、完成的意味,更具有转折、开启、生成、超越的涵义,是对理论的嬗变过程的一种富于人文意识的揭示。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教授文森特·B.利奇(Vincent B. Leitch)在《理论的终结》一文中对“终结”(ends)的概念稍加思考。该词有多种含义:枯萎、消失;丰满;关闭、终止,灾难、死亡;转折或终点;目的和目标。它唤起一系列的现象:有限性、开端和中间、预期的变化、怀旧和悼念。它暗示着残余、亡灵和永存。当终结表明调整的或精心预谋的消逝时,它不仅使人联想到保存期限,还想到循环模式,将历史编纂学与时尚融合到一起。时尚本身使人想到乏味、机会主义、可变性和肤浅。终结,像起源一样,呈现出多层和复杂的意义,“理论的终结”也是这种状况。”<sup>⑩</sup>在一个时代状况发生重大转变,思想进入反思、否思的关键时刻,终结论就会盛行起来。如果能从这个角度理解“终结”的涵义,我们的探索会减少许多似是而非的判断,而回归于学理。

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终结论”的观点:“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对于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国内学者有的赞同,有的反对。然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在同一个层面理解“终结”涵义的,即都把终结理解为终止、消亡、结束等。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的人,怎么会断然说出文学或文学研究终结(死亡、终止)之类的话来呢?仔细阅读米勒原文,我们不难感受到米勒对文学的热爱与坚守。他相信:“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

如既往的那样……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sup>③</sup>不仅如此,在另一文《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中,米勒认为文学具有“无可比拟的能力”,不仅是对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的存留,也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更是“正视陌生性”的方式。<sup>④</sup>可以看出,米勒所谓“终结”,不过是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终结,而根本不是文学研究的终结。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依然存在着,依然以各种方式丰富着我们对于人性与世界的理解。

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者,而是对已有理论的反思者和对于未来理论的探索者。后理论在反思理论(宏大理论、高端理论、文化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为未来理论探索可供选择的路标。在后理论那里,理论的终结不过是理论的复兴的另一种表达。反过来也一样,谈论理论的复兴,一定交织着理论的终结。理论的复兴和理论的终结是结伴而生、相互纠缠的。加拿大学者马西默·韦尔蒂乔就在《理论的终结》中指出:“事实上,理论似乎正在经历着某种意义上的复兴,然而不时困扰着我们的关于理论终结的问题也随之而来。”<sup>⑤</sup>理论的复兴意味着理论已经不满足于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扩展到对社会—政治文本的解读;理论的复兴还意味着文学理论有能力“成为文化批评、文化理论重要工具”,因为文学性或文学正是“使对于语言可靠性的否定认识成为可能的地方”。但是,传统文学理论不能承担这一任务,因为传统文学理论关注的是语言的逻辑和美学的功能,是文本的意义,是现实的物质历史,因此,传统文学理论必须终结。文学或文学性的凸显,要求文学理论更多关注的不是语言的逻辑或美学功能,而是语言的修辞功能。基于这种理解,作者认为“文学理论可以成为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重要工具”,文学理论大有可为。所以,马西默·韦尔蒂乔认为,理论一方面终结了,另一方面又生成了,因

为新的理论否定了那种“不以理论的不可能性为基础”、面对“文本的难题”无力回应的理论,而更加聚焦理论的文学性部分。<sup>⑥</sup>这是后理论面对终结论最富于建设性的态度。

显然,终结论在西方语境里是一个复杂性的概念,包含了多重意味,也是一个颇具文学性的策略表达,使用“终结”字样讨论问题需要分析、澄清和领会不同语境下其涵义的丰富性,而不能做决绝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后理论怀疑大理论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性,采取更加灵活与建设性的策略。例如,美国新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戴卫·赫尔曼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就特别强调反思性与建设性维度:“后经典叙事学可能缺乏初生牛犊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激情,纯粹发现所带来的不可抑制的激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符号学大革命所引起的对方法论的美好幻想,但是它的长处在于对自身范围和目的进行了更有利的反思,更好地意识到周边其它批评理论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和更具探索性的姿态,在研究叙事(或任何其他对象)时,更愿意承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sup>⑦</sup>从这一意识出发,后经典叙事学有机吸纳了传统经典叙事学的合理成分,但也拓展了叙事学关注的面,丰富了叙事学的建设路径。戴卫·赫尔曼用叙事学的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表征后经典叙事学对传统经典叙事学的超越姿态和对多种可能问题的建设性的态度。这也是新叙事学最富于后理论精神气质的特色之所在。

### 三、后理论与反理论、抵制理论

后理论是晚近理论的一种取向,而反理论则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反理论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自古希腊就开始了的文学对抗哲学的传统,一个是晚近基于实用主义立场的反理论传统。在美国批评家马克·爱德蒙森看来,理论(哲学)对文学(诗歌)敌意的种子早在柏拉图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因为诗歌无助于培养理想社会的公民。诗歌诉诸激情,也就是诉诸狂热的没有头脑的公民。柏

拉图认为激情永远应当受到控制,所以,诗和诗人应当被驱逐出理想国,柏拉图制造了哲学对文学权利的剥夺。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理论压迫文学之日,也即是文学对理论的反抗之时。文学指控理论“为规范诗歌一直使用若干分析手段”,而“分析”则是把文学置于“概念的控制之下”,结果导致批评难以发现“一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sup>③</sup>文学家认为,文学能量是难以驾驭的,“面对作品所提供的生机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快感,理论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减了作品的意味”,所以,“无论理论标准多么诱人,如果接受了它,将付出何等的代价”。<sup>④</sup>爱德蒙森主要是从诗歌的有机性、非解析性的特征来反对理论(哲学的),对理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习惯于用概念术语和概括化的思维去规训文学、知识化文学的倾向提出了挑战。爱德蒙森并不主张废弃理论,而是希望“有尽可能出色的理论,来向诗歌发出挑战”<sup>⑤</sup>。他赞同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1964年提出的)建立一门艺术色情学的观点,主张面对艺术更多地去看、去听,用我们的身体去感受,调动起活跃的生命细胞和感觉器官。他希望批评家“除具备必需的学识和天赋外,还必须具有富于想象的同情心去应答新的作品:应答可以长久地保持生命力的作品,应答一度垂死、如今由于变化的事件的推动又变得必要的作品,应答我们的同时代人创作的新鲜作品”<sup>⑥</sup>。

20世纪有影响力也最有争议的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因其一贯坚守的文本细读的立场显示出文学研究审美读解和实践批评的巨大意义,他强烈拒绝那种高高在上、试图通过概括或抽象而规约文学的做法,自觉抵制理论的诱惑或僭越。利维斯是自古希腊以来文学对抗哲学阵营里的中坚人物,他最得意的自我身份表达是“反哲学家”,希望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应当如此。他认为,真正的有教养的文学研究者,应该自觉抵制理论诱惑,不受先入为

主的判断或前理解的干扰,而善于在“直接性”中觉悟文学文本的意义、价值和理想,体味文学独特、与众不同的含混性、暧昧性、复义性。批评是对文学特性的守护和阐释,因此不是社会诊断,不是诗学理论,所以,不可能从理论到文本,或用理论替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叙事。利维斯之反理论不过是对理论的过于概括化、抽象化、简约化的做法的一种抵制,是基于文学精神的,而不是笼统的反理论。利维斯对文学批评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思考,显示出建构一种批评理论的雄心壮志。他要求批评有“协作”精神,可以有“创造性的争吵”,甚至可以持有“异见”。文学批评要懂得文学的复杂性和“潜势”,要了解人性的基本状况,懂得作品的内容形式、美感技巧等,在体会文本“活力”的基础之上做出公允的判断。利维斯一方面抵制高高在上的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张扬一种建立在文本阅读基础之上的批评理论,从而丰富和拓展文学阅读的世界。这是反理论的最积极的成果。<sup>⑦</sup>

“反理论”的另一个传统来自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又包含两个彼此关联但又各有侧重的方面:一是“反理论立场”(the anti-theoretical stance),二是“反理论”(Againe Theory)。“反理论立场”体现在社会学领域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层面的实践活动时,由于对实务取向的强调而出现“实践活动对理论的主动抛弃”。“反理论立场”并不是真的要反掉理论、否弃理论,而是抵制一种空洞的、一般性的、“预设性的”理论,回归一种社会学的小型叙事。如凯伦·罗斯科(Karen.D. Roscoe)认为社会工作具有“叙事性(narrative)特征”,主张在尊重理论的前提下肯认社会工作实践的复杂性特征以及叙事性的研究特征。叙事性特征是大理理论无法抵达的领域,具有某种后理论的意味。<sup>⑧</sup>“反理论”的另一方面则来自斯蒂文·纳普(Steven Knapp)和瓦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1982年在《批评探索》上发表的《反理论》(Againe Theory)一文。两位作

者是罗蒂实用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他们之提出反理论,主要是针对传统解释活动中所形成的理论对文本阐释的“预设性”而言的。理论是和逻辑的、理性的、秩序的或规则以及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这导致“理论特权地位的膨胀”,所以,“反理论”主张丢弃这种先入为主的、依特权行事的理论,秉持对研究对象特殊性、复杂性的尊重意识。<sup>⑤</sup>

“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 of Theory,亦译为“对理论的抵制”)是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1985年)里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在保罗·德曼看来,“抵制”不是对理论的拒绝,而是理论的一种自性或内在构成,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所以,“抵制理论”与理论的消解或终结论没有关系。相反,理论的兴盛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种抵制。抵制理论为什么会带来理论的兴盛呢?我们对此稍作分析。《对理论的抵制》(收入《解构之图》一书)最初是保罗·德曼应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研究活动委员会的邀请而为《现代语言文学学术导论》撰写的一篇文章,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这个领域主要倾向和著作的一个精选而又全面的书单,对重大争议方面予以综合和归纳,对在可见未来可望得到的解决,提出一套批判性的、纲领性的计划”<sup>⑥</sup>。但是,作者坦言难以完成这项计划所要求的任务。因为,作者相信“对文学理论的主要兴趣在于界说的不可能性”,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利于达到该计划设定的目标的,故而委员会又委托其他人撰写了该章节的内容。

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准确说应该是理论的自我作对、自我争辩、自我怀疑、自我抵制。保罗·德曼坚决反对文学研究中的内外指涉关系,认为把文本中的词语系列匆忙地和一个外在的意义搭配起来,是“忽略了文本中的语言的文学维度”<sup>⑦</sup>。因为,语言的语法结构和修辞结构是存在差异的,修辞不是语法结构的派生物,而是与语法结构“共生”的现象。活跃的修辞是语法结构的一个破坏者,也是意义的矛盾、含混、抵牾甚至冲突的制造者。批评正在

于揭示文本中隐含的矛盾、含混、抵牾甚至冲突等因素,这是解构批评最鲜明的特色之所在。保罗·德曼认为:“文学理论诞生于处理文学文本的方法,不再以非语言学的即历史的和审美的考虑为基点的时候,精细一些说,就是诞生于讨论对象,不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在意义和价值确定之前的生产和接受方式的时候。”<sup>⑧</sup>这样一来,文学理论就回到了“语言的文学性”方面。语言的“文学性”方面是唯一“能够找到有关语言言说可靠性的否定认识的地方”,在“揭示意识形态的畸变性上,都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sup>⑨</sup>。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德曼批评那些责难文学理论的人不过是“害怕自己神秘化了的意识形态,被他们试图否定的工具所揭露。”<sup>⑩</sup>

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抵制理论”)不能从通常意义上理解为一个外在于理论的人对理论的攻讦,他是在揭示修辞论的文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反对可能是理论话语的内在构成,话语表述层次上的反对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社会科学中是无须提及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正是这种有争议的反对,这种有系统的误解和误述,这种非实质性的但又永远反复出现的反对,成为理论事业本身固有的一种抵制的被置换了的症候。断言这就是不去正视从事文学理论的充足理由,就仿佛由于解剖学没有能拯救死亡而去拒绝它一样。文学理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于同自己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假设和可能性的论争。与其发问文学理论为什么吓人,也许毋宁去问它:为什么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中这么艰难,它为什么这么容易地要么陷入自我确证和自我辩护的语言,再不然就是完全代之以一种欣快的、有纲领的乌托邦理论。”<sup>⑪</sup>作对、反对、抵制等是理论的一种内在构成,抵制所抵制的正是理论自身。再进一步,德曼认为“对于理论的抵制,是一种对使用关于语言的语言的抵制。因而也是对语言本身的抵制,或者是对于语言蕴含着无法简约为直觉的因素或功能这种可能性的抵制”<sup>⑫</sup>。“无法简约

为直觉的因素或功能”，正是文本文学性的魅力和神奇之所在。对任何一个文本的“语法译码”注定是要留下“不确定性”残余的，处理这“不确定性”残余需要一种语用学意义上的转换——用“符号模式置换阐释模式”，“用译码置换释义”。<sup>⑩</sup>也就是抵制原来的阅读模式，而进入一种修辞阅读的境地。这样，文学理论内部的自我抵制就被揭示出来了：“修辞性阅读仍然回避和抵制它们所倡导的那种阅读。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于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己的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sup>⑪</sup>

澄清了反理论、抵制理论的内涵和指向，再来看后理论与反理论、抵制理论的关系，不难发现，后理论其实包含了文学反抗理论、抵制理论的积极成果。后理论拒绝大理论的高压作业，面对文本采取了一种更加灵活多样的态度，尤其强调文本的文学性方面，目的在于寻找更接近文学精神的解释方式。在大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坚定地主张回归文学、回归文学的细读传统，并以“新审美主义”或“新形式主义”来命名，表达了回归文学古老传统的意向。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实质上是对于理论的不确定性的揭示，抵制的是理论话语内部的某种固化或者简约化的倾向。理论就是要不断地对自己设定的命题或方法论的前提提出质疑，它就是这种质疑本身。无休止的质疑，不仅是文学性的精神，更是揭示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有力工具，这也是极具后理论精神气质的思想。从特定语境和知识谱系看，后理论与反理论、抵制理论具有精神的暗合之处，它们都表现为一种基于语言学立场的对于理论的反思态度，揭示的是理论的非确定性、可磋商性、不可简约性以及自我否定、自我作对的动态机制，体现了理论在特定知识学模式看待问题方式的变化。

## 余论

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所谓理论的终结，不过是某种大理论的终结。然而，即使大理论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它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仍会以某种方式在新的理论言说中得到弥散或生发。故此，理论的终结与理论的复兴结伴而行。思想的进展具有累积性，而不是“范式革命”所能概括的。后理论也可作如是观。后理论与特定语境及知识谱系下的“抵制理论”和“反理论”具有精神上的暗合之处。无论是后理论、抵制理论，还是反理论，都强烈表达了对既有理论的怀疑立场，都在寻求更具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理论的小型叙事和多种多样的理论的复数形态，对被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丢弃的文化传统持积极的理解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理论也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超越。然而，“后理论”表达的不过是理论的某种转折的倾向、趋势或主张，而并不以建构某种理论形态为目标。因为，某种理论一旦被建立，也就意味着被固化，其被颠覆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就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不是智力的温床，不是思想懒惰者的避风港，而是永不止息的怀疑、思考的方式。保罗·H. 弗莱(Paul H. Fry)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因为它带有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sup>⑫</sup>怀疑作为反思的重要维度，不仅怀疑理论言说的对象，更怀疑理论自身的构造及一切可能的前提如方法论、元命题等。不独如此，在现代社会理论还承担着独特的功能，“理论更关注意义受到妨碍的方式”，保罗·H. 弗莱为理论下的定义是：“我会把理论定义为并已经能定义为思维的一种否定性运动，勘察对交流产生怀疑的合法途径，而不是令人痛苦的、束手无策的途径。理论是与那些通常被当做真的、被假设为真的、被说成真的——被宣布、清晰地说出是真的，这说到

点子上了——东西对立的反作用力。”<sup>⑤</sup>由此看来,理论不会死,理论活着,理论仍然在路上,而理论的反思正在进行。

#### 注释:

①Docherty, Thomas. *After Theory: Postmodernism/Post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②McQuillan, Marti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and Stephen Thomson. "The Joy of Theory".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s. Martin McQuillan and Graeme Macdonald.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9. p. XIV.

③Bordwell, David, and Noël Carroll. Eds. *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中译本参阅麦永雄、柏敬图等译:《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大卫·鲍德韦尔、诺维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柏敬图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5—10页。

⑤这之前还有几部值得关注的书,也涉及了理论或后理论问题:1. Butler, Judith, John Guillory and Kendall Thomas. Eds. *What's Left of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Cunningham, Valentine. *Reading After Theory*, Blackwell, Oxford, 2002; Rabaté, Jean-Michel. *The Future of Theory*, Blackwell, Oxford, 2002.

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⑦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⑧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前言第1页。

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1页,第213页。

⑩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27页。

⑪“后理论时代”出现在国内许多理论著作和论文里,例如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宋伟:《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批评理论建构》,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张公善:《生活诗学:“后理论时代”的美学新形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金永兵:《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吴子林:《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何卫华,谢海燕:《〈理论之后〉:“后理论时代”的认知测绘》,《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等。但这里“后理论时代”通常未加界定,更缺乏论证,只是在理论之后理论新变的意义上来使用,“后理论时代”成了表征当下理论状况的一个宽泛的能指。王宁2005年在《“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一文中开始使用“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事实上,“后理论”是否够得上一个时代,也还处于争论之中。更何况,飞速发展的理论是否会进入一个“后-后理论”时期,也还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伟《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批评理论建构》所讨论的现代性终结、后现代理论、启蒙的神话、主体性的黄昏、生存论美学、实践论美学、语言学转向、文化工业、视觉文化、景观社会与、空间转向等,其实是后现代主义问题而不是后理论问题。作者似乎是要借“后理论时代”这一命名来表达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追踪和理解。“后理论时代”与“后现代时代”“后现代语境”或“后现代转折”等具有同等意义,这就误置了后理论的涵义。

⑫徐亮:《后理论的谱系、创新与本色》,《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⑬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⑭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出路》,《中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⑮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出路》,《中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⑯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3页。

⑰金惠敏:《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2、243页。

⑱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⑲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⑳原文为:“I'm not, of course, arguing that theory has ended, or that theory ever could end, but that I think—put it this way—I think that that sort of high theory has been over for a long

time." Jarvis, Matthew. "Talking After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English Vol. 53(Autumn 2004):177-190.

②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

②文森特·B.利奇:《理论的终结》,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

③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④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⑤胡亚敏主编:《“文化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⑥胡亚敏主编:《“文化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2页。

⑦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第24页。

⑧马克·爱德蒙森著:《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10页。

⑨马克·爱德蒙森著:《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东译,第29页。

⑩马克·爱德蒙森著:《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东译,第258页。

⑪马克·爱德蒙森著:《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

达》,王柏华、马晓东译,第160-161页。

⑫参阅孟祥春:《“反理论”与“理论”——论利维斯的批评观》,《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⑬参阅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⑭Mitchell, W. ed. *Against The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Pragmat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 11-30.

⑮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⑯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93页。前言,第4页。

⑰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98页。

⑱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03页。

⑲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03页。

⑳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04页。

㉑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05页。

㉒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08页。

㉓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第114页。

⑳保罗·H. 弗莱(Paul H. Fry)著:《文学理论》,吕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3页。

㉑保罗·H. 弗莱(Paul H. Fry)著:《文学理论》,吕黎译,第378页。

## Post-Theory and Related Questions

Xing Jianchang

**Abstract:** Post-theory has been traveling in China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the questions it has raised need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ory, theory of resistance and anti-theory needs further explanation. Post-theory is not the ends of theory, nor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nor the anti-theory. Analyzed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and with the model of knowledge science, post-theory accords with "theory of resistance" and "anti-theory" in spirit. Post-theory is a skeptical attitude towards big theory, a tendency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r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mentum, or even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returning to literary tradition and recommencing aestheticism. Post-theory does not aim at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form and ideological trend. The so-called ecological ethics, life politics, post-humanity, new aesthetics, new narratology, new literary theory, etc. are just an adjustment, repair or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itself in the post-theoretical spirit atmosphere, showing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ost-theory; End; Theory of Resistance; Anti-theory; Reflection